

遵义师范学院黔北文化中心“黔北文化论丛”

从边缘到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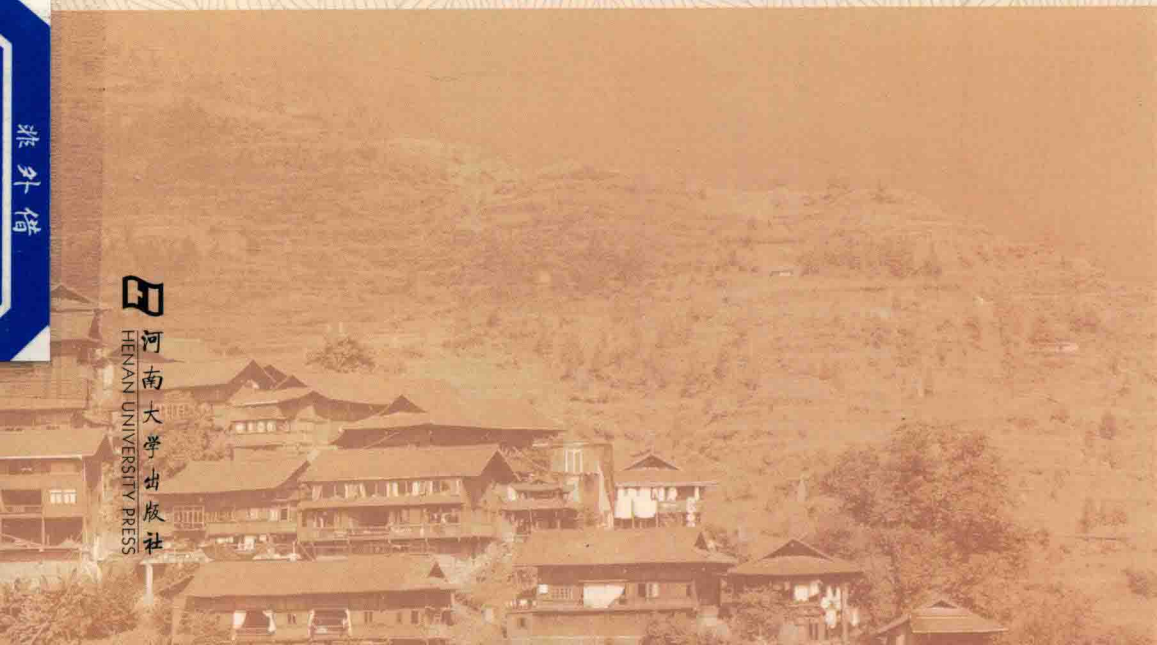
遵义『沙滩文化』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黎
铎
主
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海外借



遵义师范学院黔北文化中心“黔北文化论丛”

CONG BIANYUAN DAO ZHONGXIN

从边缘到中心

——遵义“沙滩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5年9月28~30日·遵义)

黎 铎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边缘到中心:遵义“沙滩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黎
铎主编.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5649-2629-8

I. ①从… II. ①黎… III. ①文化史—遵义—文集
IV. ①K297.3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4574 号

责任编辑 马 静

责任校对 李韦毅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开封智圣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44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遵义“沙滩文化”学术研讨会
编委会

主任	关爱和	吴有富		
编委	黎 铎	张 鹏	刘 丽	
	胡全章	袁礼辉	孙建方	

前言

在中国文学史的地图上,贵州一直是一片荒芜的沙漠。虽然在汉代就有了第一个作家盛览,但仅留下《合组歌》、《列锦赋》两个篇名。直到唐代,始有罗荣《忠爱堂叙》和杨端《罗氏忠爱堂谱序》两篇散文存世,虽说最早的别集是宋赵高峰《青莲院诗集》和元杨汉英《桃溪内外集》64卷,惜片言无存。杨汉英的《咏九嶷图》是贵州现存最早的诗歌。可以说,在明代建省以前,贵州文学乏善可陈。

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贵州建省,府、州、县、卫官学纷纷建立,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贵州文学初露端倪。莫友芝在《雪鸿堂诗搜逸·序》中,对明代黔诗的发展概貌及诗家,作了概括性的追述:

“黔自明始有诗,萌芽于宣、正,条衍于景、成以来,而桐豫于隆、万。自武略(王训)而止庵(詹英),而用章(黄绂字)、廷润(周瑛字)、竹泉(易贵)、汝锡(安康字),而时中(徐节字)、西园(越英),而唐山(范府字)、子升(王木字)、宗鲁(陈文学字)、伯元(汤昇字),而道父(蒋宗鲁字)、吉甫(李佑字)、徐川(吴淮字)、元淑(周文化字),百有余年,榛莽递开,略具途轨。山甫(孙应鳌字)、湜之(李渭字)、内江(马廷锡)诸老,又一意儒学,特余事及之。洎乎用霖(潘润民字)《味淡》、卓凡(越其杰字)《屡非》,炳麟铿訇,道乃大启。一时方麓(李时华字)、邓州(艾友芝)、泠然(杨师孔字)、瑞明(莫天麒字),心易(陈尚象字)、循陔(邱禾实)、美若(蒋杰字)、无近(王远祚字),少崔(何一中字)、小范(蒋劝善字),旗鼓响应。延、温、沅、沅间,几于人握灵珠,家抱荆璧。而其咀

嚼六代,步骤三唐,清雄宕逸,风格俊远,尤以君采谢先生称首。”莫友芝辑《黔诗纪略》33卷,搜录明代黔中诗人241位的作品2406首,加上方外的68首和无名氏的24首,共计2498首。孙应鳌、谢三秀、杨龙友、吴中蕃为黔中“明代四大家”。但在中国文学史地图上,也仅是抹上了淡淡的一笔。

清代咸丰、同治、光绪时崛起于黔北的“沙滩文化”,被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张其昀先生誉为“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之文化区”。“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贵州在中国文学史地图上争得了一席之地。为宣传、弘扬“沙滩文化”,1992年,黎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贵阳举行,2006年,纪念郑珍诞辰200周年暨遵义沙滩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遵义举行;2008年,纪念黎庶昌诞辰170周年暨遵义沙滩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遵义举行;2011年,纪念莫友芝诞辰2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先后在独山、遵义举行;先后收到学术论文近二百六十余篇,出版了《贵州文史丛刊·黎庶昌专辑》、《遵义沙滩文化论集》一、二集。“沙滩文化”这一概念逐渐为国内外学者所接受。据不完全统计,时到今日,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达300余篇,对郑、莫、黎及沙滩文化作专题研究的硕士、博士论文就有24篇,涉及的有52篇。研究专著、原著整理点校30部。作品被收入诗集、诗歌鉴赏集、词集、文集、文论集者近百篇。

以弘扬地方文化为己任的遵义师范学院黔北文化研究中心,为进一步扩大“沙滩文化”的影响,与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合作,于2015年9月28日至30日在遵义师范学院举行了“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沙滩文化’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遵义师范学院和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主办,遵义师范学院黔北文化研究中心及遵义师范学院科研处承办,共收到论文22篇,本论丛即是会议的学术结晶。

黎 铎

2016年9月

目 录

守望艺术的壁垒

——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 关爱和(1)

从苏州出发:诗人眼中的苗乡

——舒位、贝青乔旅黔诗之比较 马卫中(23)

程恩泽、祁寯藻诗学异同 孙之梅(37)

试论近代的欧化白话文 袁 进(53)

贝青乔《苗妓诗》论略 陈国安(67)

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初集考述 付建舟(79)

“肌理说”与翁方纲的诗学精神 吴中胜(93)

清末《大公报》诗歌与诗界革命运动 胡全章(110)

黄遵宪的诗歌创变、诗学观念与文化选择 左鹏军(140)

中国近代女权小说的社会及文学史意义 刘 琦(164)

西洋形象的重构与晚清古文的新变

——黎庶昌《西洋杂志》“舆地之学”的文学书写 吴 微(176)

巢经巢诗论纲 张寅彭(188)

《黎庶昌全集》前言 黎 铎(192)

郑孝胥与晚清“郑珍热”之生成 杨萌芽(201)

论《西洋杂志》的延与革 任在喻(211)

从醇儒到维新

——《上穆宗毅皇帝书》到《敬陈管见折》的黎庶昌

- 思想发展 刘 丽 (218)
- 郑珍《巢经巢诗钞》“白战”手法浅析 赵 玲 (231)
- 《西洋杂志》：近代西方映像的东方认知与思考 唐燕飞 (236)
- 黔北沙滩教育源流考 张嘉林 (245)
- 沙滩文化背景与黎焕颐创作 黎 洌 (256)
- 抒写充沛的现实人生
- 论郑珍亲情诗 罗筱娟 (267)

守望艺术的壁垒

——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

河南大学 关爱和

自唐代韩、柳所策动的以复兴儒学为旗帜,以取法先秦、两汉文章传统相号召,以改革文风、文体、文学语言为主要内容的古文运动之后,“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①,奇句单行、不事骈偶的散文文体便被特指为“古文”。而以周、孔、庄、孟、《左》、《史》、韩、柳一以贯之的道统、文统自守,立志于“蓄道德而能文章”,且留意“事信”、“言文”、“规模”、“繁简”之类艺术法度的散文作家则被称之为古文家。相同的志向、情趣、识度与风格追求,又使得一些古文作家义结同心,形成了呼朋引类、标榜声气的古文流派。古文家结盟联袂、鼓荡风气者以唐宋为盛;而标榜声气、划疆辟域者又以明清为甚。

古文家在为古文鼓噪正名时,总是以见道、明道之类的语汇去诠释古文的存在价值。如果古文的价值仅限于见道、明道,其存在的意义便会大打折扣。古文作为我国古代散文的重要品类,其以奇句单行、不事骈偶作为外在形式特征,而以抒情言志、说理叙事作为基本文体功能。古文的抒情言志、说理叙事的文体功能中包含着应用与审美两个价值层向。古文的应用价值,表现为以奇句单行的语言结构形式,行使表情达意的语言载体功能;古文的审美

^① 韩愈:《答李翊书》,《古文辞类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页。

价值,则表现为调动有效的艺术手段,使这种表情达意变得鲜活生动、顾盼生辉,从而成为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创造。古文的应用与艺术价值,是古文能够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经久而不衰的两轮与两翼。

由此,古文在被不同修养、不同目的的作者使用时,自然又会分别突出其应用性或审美性特征。古文家以古文为学,则以维护古文存在的独立性,古文发展的纯洁性及总结传播古文写作的艺术原则为基本职志。在古文的应用与审美的双重价值定位中,古文家更看重古文的审美价值,更注重古文写作中的艺术性原则,更强调古文表情达意过程中艺术与情感的含量及构成。凭借于此,古文家划清了与非古文家,或单纯把古文作为一种语言载体和实用性工具者的界线。

桐城派形成于清初,消亡于“五四”,是有清一代拥有作家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散文流派。作为中唐以来古文运动的收束者与殿军,桐城派作家在纷纭繁杂的政治与学术思潮的推移变换中,守望着古文的艺术壁垒;在与义理学家、考据学家、经世学家的辩诘争讼中,深化着其对古文文体文学特质的认识。以桐城派为个案,考察其守望与深化的过程,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由传统杂文学体系向现代文学体系的过渡,是不无裨益的。

程朱理学在两宋时期走向成熟。当理学逐渐成为中国晚近时期意识形态的核心时,古文家的生存状态明显地有了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是韩欧时期古文家被“天下翕然师尊之”^①的至荣一去不返;其一是古文家津津乐道的道与文一、道统与文统的圆满重

^① 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文集·卷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5页。

合,不得不分离为道以程朱之学为准的,文以韩欧之学为标尺。古文家必须面对思想与艺术两个尺度不同的准则。这便是清代桐城派创始人方苞何以把“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作为行身祈向的根本原因。

辗转于学行与文章之间的方苞论古文之难成云:

仆闻诸父兄,艺术莫难于古文。自周以来,各自名家者,仅十数人,则其艰可知矣。苟无其材,虽务学不可强而能也;苟无其学,虽有材不能骤而达也;有其材,有其学,而非其人,犹不能以有立焉。盖古文之传,与诗赋异道。魏、晋以后,奸佞污邪之人而诗赋为众所称者有矣,以彼瞑瞶于声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状,亦所谓诚而形者也。故言工而为流俗所不弃。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故自刘歆承父之学,议礼稽经而外,未闻奸佞污邪之人而古文为世所传述者。^①

方苞在此段话中表述了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将古文归属于艺术范畴,是与经学、文学所不同的学科类别。二是言古文之与诗赋,同类而异道。诗赋言工情盛者即可流传,而古文本经术而依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者不可成就。三是论古文难成。古文难成在于古文以学问、材质为基础,而学问不能骤而达,材质不可强而能;有其材,有其学,而非其人,犹不能为古文,此所以“自周以来,各自名家者,仅十数人”的原因。经术之根柢,立身之大节,在方苞看来,是古文家成就古文的前提。名为古文,而不能“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此种文字则决计不能为世所传述。古文难成,难在学问深广淳厚,立身节高操洁。

祈向学养与义法途径,虽有先后虚实难易之分,但同样不可缺

^① 方苞:《答申谦居书》,《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页。

少,不可忽视。以祈向学养为基,而以成就古文为果;以祈向学养为筏,而以成就古文为渡;以立身学养为手段,而以志乎古文为目的,此正是古文家不同于经学家之处,重视立身学养,而不鄙薄义法途径,此又是古文之所以划入艺术范畴,而又与诗赋异道的原因。

古文除了讲求义法、途径等艺术构成外,还讲求情感构成。方苞《与程若韩书》论及传志文的写作原则云:

来示欲于志有所增,此未达于文之义法也。昔王介甫志钱公辅母,以公辅登甲科为不足道,况琐琐者乎?此文乃用欧公法,若参以退之、介甫法,尚可损三分之一。假而周秦人为之,则存者十二三耳。此中出入离合,足下当能辨之。足下喜诵欧阳文,试思所熟者,王武恭、杜祁公诸志乎?抑黄梦升、张子野诸志乎?然则在文言文,虽功德之崇,不如情辞之动人心目也,而况职事族姻之纤悉乎?①

方苞此文主要论述志文依周秦及唐宋古文义法,应该简胜于繁,而繁与简的关键,又在于对志主的事迹如何取舍。在方苞看来,志文记述志主功德之崇,不若情辞之动人心目。至于职事族姻,更琐琐不足道。方苞的取舍标准,自然是依照古文家的见识。以情辞动人,也是古文家特别是明代归有光之后所形成的传记志文写作的传统之一。方苞曾论及归有光写亲旧之人日常之事而以情辞见长一类的文字时说:

震川之文……其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俟修辞,而情辞并得,使览者

① 方苞:《与程若韩书》,《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

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①

归有光之文以极富人情味的笔触，写身边亲旧琐事，情发于中而娓娓道来，使读者因其辞思其情而引发惻然之隱。此正是辞章能事之所在，情感力量之所在。情辞是文学家所擅长的艺术手段，而情感是文学家与读者交流的最佳通道。

方苞对古文艺术与情感构成的认识，源于一个古文家对古文文体表情达意特性的理解和把握。方苞的这种认识，和他对古文创作其他特性的体悟，最终被笼括于义法说之中。不同的作者，对创作素材的剪裁取舍不同，其作品中艺术与情感的构成也便不同；不同的文体，其目的、功能不同，艺术性、情感性及实用性的成分也会各有差异。方苞《李穆堂文集序》中论李氏所著之文曰：“其考辨之文，贯穿经史，而能决前人之所疑；章奏之文。则凿然有当于实用；记序书传状志表谏，因事设辞，必有溉于义理，使览者有所感兴而考镜焉。”^②不同用途、不同文体，都能做到驾轻自如的因事设辞，恰如其分的因辞见意，言之有物，言之有序，物序合于体要，言语归于雅正，此正是古文学之所有事。也正是“艺术莫难于古文”的真实含义。

方苞于经学致力于《三礼》、《春秋》，于文学则义归于义法之说。方苞以古文名世，经学无论焉，其得享大名，一是创义法说，以有物有序规范古文；二是选《钦定四书文》、《古文约选》，以古文之波澜意度，旁通于时文。

时文是与古文相对而言的，是明清科举取士所规定采用的专门文体。它具有严格的思想标准，其命题自乾隆年间一律用《四

① 方苞：《书归震川文集后》，《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页。

② 方苞：《李穆堂文集序》，《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

书》的语句,义理的发挥必须依照朱熹的传注。时文的写作又具有严格的程式,讲究体会语气,代圣人立言,讲求破题、承题、起讲、入题等起承转合的技巧。时文对每一读书人来说,是入仕的必修之课,而能否入仕,则视时文作的好坏。这样,以帮助士子熟习和掌握时文文体为目的的各种选本纷纷应世,而研究时文文体的名家也应运而生。明清两代,时文的好恶取舍标准,受现时代学风士风的影响,也处于不断变换之中。

时文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格式的文体,其在恪守义理、表情达意、遣词造句方面,也多有与古文行文原则相通之处。方苞奉旨选《钦定四书文》及代果亲王选编《古文约选》,即试图将清朝所推崇的“清真雅正”的衡文标准融会于选辑过程之中,以《左》、《史》、唐宋古文之波澜意度,旁通于时文制艺之作。其《古文约选序例》中说:

自魏晋以后,藻绘之文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肄也……学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公》、《谷》、《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①

以古文通于时文,并不始于方苞。明代唐宋派中的唐顺之、归有光等即被人称为“合古今之文而兼有之”,但唐、归所为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方苞之说,是以“功令”的面目出现的,其对社会的影响更为巨大。正是通过士子之学的渠道,方苞的义法说及桐城派的古文理论,获得相当的知名度和广阔的植被地带。

对于方苞有关古文艺术性、情感性的认识及以古文为时文的实践,稍后于方苞的乾嘉学派的代表性学者钱大昕持有不同的看

^① 方苞:《古文约选序例》,《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12页。

法。其《与友人论文书》从三个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意见。

首先，钱氏论古文之体用曰：

夫古文之体，奇正浓淡详略，本无定法，要其为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后以法律约之，夫然后可以羽翼经史而传之天下后世。^①

钱氏以为：古文之体，奇正浓淡详略，本无定法，方苞以简驭繁的义法说很难说尽得古文之真谛。古文之用在于明道、经世、阐幽、正俗，有此四用而兼以法约束之，可以羽翼经史而传之天下后世，古文之于经史，一仆一主，其名分不可僭越淆乱。此与方苞以经史学养为基，以成就古文为果的出发点大有不同。

其次，钱大昕就方苞关于志文写作中“虽功德之崇，不如情辞之动人心目”之说予以批评。其言曰：

至于亲戚故旧聚散存没之感，一时有所寄托而宣之于文，使其姓名附见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无足传，故一切阙而不载，非本有可纪而略之，以为文之义法如此也。方氏以世人诵欧公王武恭、杜祁公诸志不若黄梦升、张子野诸志之熟，遂谓功德之崇，不若情辞之动人心目，然则使方氏援笔而为王、杜之志，亦将舍其勋业之大者，而徒以应酬之空言了之乎？^②

志文写作中，取其功德之崇，还是取其故旧聚散存没之感，有作者的见仁见智的选择问题。作为古文家，方苞以为“虽功德之崇，不如情辞之动人心目”，其所强调的是以情动人；作为经学家，钱大昕以为要视志主具体情况而定。志主事迹原无可传，则可敷

① （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四部丛刊本。

② （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四部丛刊本。

衍以情辞，志主勋业伟大，则不应徒以应酬之空言而敷衍之。其并不认为情辞必然比功德更为可贵。相反，情辞应是志主无功德可言时的应酬之语。与之相应，也不应以读者熟悉与否判断文章的价值。

再次，钱大昕以为方苞以古文义法通于时文的作法，为世俗选本之古文，方苞的义法说所得为古文之糟粕，而非古文之神理：

盖方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义于何有？昔刘原父讥欧阳公不读书，原父博闻诚胜于欧阳，然其言未免太过。若方氏乃真不读书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文之波澜意度近于古而喜之，予以为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王若霖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方终身病之。^①

乾嘉学派以博闻为恃而傲视辞章家，因而钱氏指责方氏不读书也是习常之论。方苞以古文通于时文的实践，为桐城派古文理论开辟了植被地带，但也因此而招致“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的讥讽。方苞之后，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发展，始终与科举制艺之文有着不间断的联系。尤其是那些未曾致身仕途的桐城派作家，终身以教授生徒谋食糊口，虽不否认其抱有“以古文为时文”之初衷，但却很难免除“以时文为古文”的批评。因为他们在讲述“意度波澜”、“精神气魄”、“疏宕顿挫”、“草蛇灰线”一类的术语时，确实使人难辨其为古文之法还是时文之法。

二

桐城派自姚鼐后，规模渐成，名声噪起。处在考据之学炙手鼎盛时期的姚鼐，在学术界义理、考证、辞章三事孰主孰从的争论中，

^①（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四部丛刊本。

以甘蒙谤讪，捐嗜舍欲的精神，为辞章之学坚守着阵地。姚鼐自言对古文辞的酷爱与追求道：

鼐性鲁知暗，不识人情向背之变，时务进退之宜，与物乖忤，坐守穷约，独仰慕古人之谊，而窃好其文辞。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维风俗以诏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达其辞则道以明，昧于文则志以晦。鼐之求此数年矣。瞻于目，诵于口，而书于手，较其离合而量剂其轻重多寡，朝为而夕复，捐嗜舍欲，虽蒙流俗讪笑而不耻者，以为古人之志远矣，苟吾得之，若坐阶席而接其音貌，安得不乐而愿日与为徒也。^①

桐城派自姚鼐起，越来越明确地形成了古文作为一门艺术而存在的共识。姚鼐弟子方东树勇于自信而好为议论，其综合方、姚之说而论及古文之难云：

是故文章之难，非得之难，为之实难。道德以为体，圣贤以为宗，经史以为质，兵刑政理以为用，人事之阴阳、善恶、穷通、常变、悲愉、歌泣，凌杂深颐以为之施；天地、风云、日星、河岳、草木、禽兽、虫鱼、花石之高旷夷险，清明黜露，奇丽诡谲，一切可喜可骇之状，以为之情。及其营之于口而书之于纸也，创意造言，导气扶理，雄深骏远，瑰奇宏杰，蟠空直达，无一字不自己出，而后吾之心胸、面目、声音、笑貌若与古人偕，出没隐见于前。而又惧其似也，而力避之；恶其露也。而力覆之；嫌其费也，而力损之。质而不俚，疏而不放，密而不塞。阴阳蔽亏，天机阖开，端倪万变，不可方物。盖自孟、韩、左、马、庄、《骚》、贾谊、扬雄、韩、欧以来，别有能事，而非艰深险怪，秃削

^① 姚鼐：《复汪进士辉祖书》，《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